

张艺谋与咸阳市工人文化宫的一段情缘



咸阳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摄影组”成员：文化宫摄影专干陈军令(左一)、陕棉八厂工人张艺谋(左二)、陕棉八厂宣传部干事刘彦臻(右二)、陕棉八厂工人张健(右一)合影。

回忆是一张照片，一张发黄褪色的老照片。寂然凝望、青春不再，鬓发染霜、岁月沧桑。虽陈年老酿，却回味无穷……

前不久，咸阳市工人文化宫主任赵文华告诉我，他手上有两张著名导演张艺谋在文化宫留影的老照片，是文化宫已去世摄影专干陈军令先生家属转送来的。想想我调入文化宫至今已有20余年，自建宫半个多世纪，国内著名人士阎纲、周明、雷抒雁、陈忠实、莫伸、叶广岑等不少大家曾来文化宫讲学授课、传经送宝，可真正保存下来的图片、资料有限。加之，手头正拟写一篇有关职工文化的稿子，获悉旧照格外高兴。

照片是真实的记录。当我见到这两张旧照时，逐一端详，一张是张艺谋与他的7位摄影友站在文化宫院内柳树成荫的通道上，个个精神抖擞、笑逐颜开，一番辨认皆不认识；另一张是张艺谋和他的3位摄影友合影，胸前或挂或手托相机。最令我眼熟的是拍摄地点，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文化宫院内的露天舞台。那时候，我是一名插队知青，依稀记得，因文化宫早年就创办了内刊《职工文艺》月报，劳作之余，我时常写点散文、诗歌、曲艺等小稿，聊以自慰，只要返城总会抽空到文化宫投递稿件。一进文化宫大门端直走百米，就是这一方露天小舞台，砖混结构，高度约80公分，舞台前沿是用圆钢管制成的扇形防护栏，约20公分高，一来安全，二来美观；舞台背景是高大的立式标语牌，上书毛泽东同志名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因是黑白照，年代久远、略为泛黄，至于标语牌何底色、字体啥颜色，还真说不上来。

端详旧照，促使我寻觅旧照背后的故事。1968—1971年，张艺谋初中毕业后在咸

阳市乾县汉阳公社倪村插队落户，历经3年时间上山下乡磨砺，挥手告别知青岁月。1971年秋，他被招入位于咸阳市火车站西边的陕西第八棉纺织厂，分在前纺车间当工人，从事推卷工体力劳动。由于好学肯钻、能写会画，1975年底，被调入该厂织袜车间工艺组做袜子花型设计工作。一次，他设计的袜子上面有地球图案，同事诧异：“臭袜子上为啥有地球？”他幽默一笑：“立足八厂，放眼全球嘛！”他的设计在陕纺系统获得了优秀奖。

正是这一时期，他迷恋上了摄影，在厂内拍了许多照片，多半是聚焦生产一线，定格纺织工人。

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和文化宫摄影专干陈军令常来常往、交情笃深，曾多次参加文化宫举办的摄影技艺讲习班，精益求精、充盈人生。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面向全国招生，张艺谋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消息在厂里传开。由于超龄，咸阳几个要好的摄影友，纷纷出主意、想办法。他们协助张艺谋拿出高质量的摄影作品集(按当年北影摄影系要求，每位考生务必提供不少于50幅的个人摄影作品集)，用实力说话。文化宫摄影专干陈军令让王雪峰打开暗室，提供显影、定影粉包，相机和放大烘干设备，全力配合张艺谋制作个

人摄影作品集；吴德功则把张艺谋的12寸照片全部贴在双道林纸上，再用布包三合板做成精美的封面，《张艺谋摄影作品集》完成后，几经辗转，被送到了时任文化部部长黄镇手上。黄镇部长见到如此精美的摄影作品，即手书一封信给北京电影学院并电话联系，才使得这位超龄学员破格进入北影摄影系学习，且被指定为学习委员。

1982年张艺谋毕业后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1984年他在电影《一个和八个》中首次担任摄影师，且在自己工作过的陕棉八厂邀请了不少群众演员，这部电影后来荣获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师奖；1986年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老井》夺三座影帝；1987年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获中国首个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从此，谱写了他从摄影师到演员再到导演的人生三部曲。

今年“五一”小长假，我走访了张艺谋早年所在企业——原陕西第八棉纺织厂。经文友联系，我登门拜访了曾与张艺谋同为工友、摄友，后任厂宣传部部长的刘彦臻先生。一阵寒暄后，我掏出手机让刘老看我收藏的两张旧照，“您老瞧瞧！这两张旧照，是何年何月在文化宫拍的？”

他看后若有所思，说：“这两张照片是1976年8月在文化宫筹办‘咸阳市工业学大庆展览’时所拍。”他向我一指认出4人的姓名。其中8人的合影，也许时光太久，他只辨认出陈军令、张艺谋、王来学和张健。

我喃喃自语，不由自主冒出一问：“这8人合影中咋没您呢？”

刘老用手轻点额头，忽然兴奋地说：“我想起来了，这8人合影中也没有国棉七厂李万山，不是他拍的，就是我拍的。”我们不禁笑了起来。



陈军令(左三)、张艺谋(左四)等八位摄影友在咸阳市工人文化宫林荫道合影。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也许是感到寂寞了……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S会馆”即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周氏兄弟当时正居住于此。“金心异”就是钱玄同(林纾小说《荆生》有一影射钱玄同的人物“金心异”，故而鲁迅移用)。两年半以后，鲁迅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所作《著者自叙传略》中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就直接提到了钱玄同的名字：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处的名字发一点短论。

由此可见，鲁迅踏上新文学之路与钱玄同有非同寻常的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

《狂人日记》的诞生——五四前夜的钱玄同与鲁迅

中，钱玄同“偶或来谈”的“那时”大致是什么时候呢？钱玄同日记1918年3月2日云：“晚访周氏兄弟。”甚为可惜的是，该年4月至年底的钱玄同日记不存(1918年1月至3月1日的日记也有许多漏记)，幸好鲁迅和周作人日记均存，可作补充。

鲁迅日记1918年2月9日“晚钱玄同来”；15日“夜钱玄同来”；23日“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3月2日“夜钱玄同来”；18日“夜钱玄同来”；28日“夜钱玄同来”。4月5日“晚钱玄同、刘半农来”；21日“夜钱玄同来”；26日“夜钱玄同来”。周作人日记记得更具体，1918年2月9日下午“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5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后去”；23日晚“玄同来谈，至一时去”；28日“晚玄同来谈”。3月2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18日晚“玄同来谈”；28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去”。4月5日“玄同半农来谈，至十二时去”；17日“以译文交予玄同”；21日“晚玄同来谈，至十二时半去”；26日“晚玄同来谈，十二时半去”。

短短三个月之内，钱玄同造访周氏兄弟竟有十次之多，且均在晚间，均谈至深夜十二时以后，足见谈得多么投契和深入！而且，正因为均是晚间造访，夜深静谧，犬吠

他点着一支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我比谋谋(这是他对张艺谋的昵称)大两岁。在乾县插队时，还是我跟同事把他和刘梦樵、滑尔刚、吉安庆等4位知青一同接入厂的。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不仅喜好打篮球也嗜好绘画写字，经常被抽调下来写写画画，搞宣传专栏、板报、墙报。此间，学会了用相机拍照，从此一发不可收。他曾七上西岳华山，拍摄‘白云深处有人家’‘迎客松’等多幅精品，屡获全国摄影大赛奖项并被国内最具权威的杂志《人民画报》刊登。记得，在市工人文化宫宣传干事田园老师邀请下，谋谋与其他摄影爱好者一起成为文化宫对外宣传栏的承办者，经常集中为宣传栏投递摄影作品，并一起布置文化宣传栏和书画摄影展。在文化宫摄影专干陈军令组织下成立了‘职工摄影组’，与早期为数不多且热衷于职工业余摄影的积极分子一道外出采风拍摄作品。一度，整个人几乎‘泡’在了文化宫。”

他呷口茶继续说：“机遇总是眷顾那些奋斗之人。谋谋曾多次被市上或文化宫抽调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既是一种认可，更是一份荣耀。他与西北国棉一厂工会宣传干事王来学、西北国棉七厂工会主席李万山、西北橡胶厂宣传部干事杨西民、市深井泵厂工会宣传干事张肇新、咸阳纺织机械厂工会副主席王富章、陕西第二针织厂工会宣传干事卢武汉等一起参与‘咸阳市工业学大庆展览’，主要展示咸阳工业企业所取得的成就和涌现出的各类劳模、先进人物事迹。展览规模挺大，有上千幅图片。我印象中，谋谋出力最大，他拍了许多照片，暗室技术也好，不达誓誓不罢休。筹办历时一个多月，占据了文化宫院内好几个展厅，连剧场后台都布置了。国庆节夕开幕的，观众络绎不绝。有的工人见自己的形象上了展板，兴高采烈。”

说时迟，那时快，刘老匆忙走进卧室，从书柜里抱出一摞相册，摆放在床边，逐一翻开相册，让我瞧他珍藏的张艺谋早期在陕棉八厂所拍的劳模、先进人物照片。边指边说：“这些都是用厂宣传科唯一一部摇把120相机拍摄的。”

“穷要车子富要表，玩照相机是傻屌”是那个年代人的口头禅。那会儿能玩照相机，是十分奢侈的事。偌大的咸阳市区，除过不多的国营大企业宣传科，工会配有照相器材，其他小单位压根就没有。个人能玩得起的也是凤毛麟角。张艺谋在陕棉八厂能玩照相机，一是人缘好，能够借到宣传科的相机；二是缘于结识了单位动力科工人张健。每逢礼拜天，张健都会借用父亲的相机与他一起分享。

不止，以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会说金心异“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尽管如此，“怕狗”的钱玄同仍不断造访。可以想见，钱玄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定要说服鲁迅为《新青年》撰文。因此，这个时间段应该就是鲁迅《〈呐喊〉自序》中所说的金心异频频造访，打断了他埋头抄写古碑的兴致，“终于答应他(指钱玄同——笔者注)也做文章了”的“那时”。而周作人4月17日“交予玄同”的“译文”，应该就是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贞操论》(与谢野晶子作)。

同期《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既是钱玄同不断催逼的可喜结果，更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以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狂人日记》落款“一九一八年四月”，但小说更为具体的写作和发表经过，鲁迅哪一天完稿，哪一天交予钱玄同，钱玄同日记失记，鲁迅日记也未明确记载。不过，《狂人日记》文前“题记”末尾署“七年四月二日识”，如果小说确实于1918年4月2日杀青，那么，钱玄同1918年4

月5日晚与刘半农同访周氏兄弟时，得到这篇小说稿的可能性应为最大吧？关于《狂人日记》的诞生，周作人后来在《金心异》中有过较为具体的回忆，与本文的推测大致吻合：

钱玄同从八月(指1917年8月——作者注)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四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新青年》第四期第五号在刊出《狂人日记》的同时，还刊出了鲁迅以“唐俟”笔名所作的新诗《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鲁迅后来在5月29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拙作少许”即指《狂人日记》和这三首新诗，而鲁迅



张艺谋早年拍摄的省级劳模、陕棉八厂漂染车间工人张茂林。



72岁的刘彦臻先生展示他收藏的老照片

就连当时市面并不多见的东风牌120照相机，张艺谋还是通过张健才有了使用这种高级照相机的机会。再后来，他为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相机，想了很多办法来攒钱。

当我再次端详旧照，暗自思忖：大凡成功人士，人们只羡慕他的光鲜亮丽，却忽略了他当初芳华岁月里，曾鲜为人知的奋斗足迹和酸楚泪滴。不由感叹：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张翟西滨

往事

中国历史上的「劳动节」

养之者天也。”表达出古人对务农必须天、地、人协作方能丰收的认识。同时，二月二日还是土地公公的寿辰。可见，对农历二月二日这农耕社会里天地人合作的关键日子，的确该盛典欢庆。

史载，从唐代开始，农历二月二日被定名“耕事节”或“劳农节”。当日皇帝要亲率百官到田间劳作，农民则被要求携带扎着红绸布的农具下地耕播。

明代永乐年间，为规范皇帝亲耕，京城里特地修建了先农坛，圈划出一亩三分田供皇帝专用。清代雍正皇帝还在圆明园西南隅专设“一亩园”，以便自己无暇分身时就近亲耕。这里顺便说一句：在17世纪、18世纪席卷欧洲大陆一百多年的“中国热”中，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的建议，于1756年在巴黎城郊效仿中国皇帝下田劳作，实施了“亲耕”。清代一幅《皇帝耕田图》在绘制皇帝亲耕场景的空白处题写道：“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清政府还明文规定：“凡七十以上耕者，免赋税杂差，劳农节赏绢一匹，棉十斤，米一石。”

中国农历二月二日帝王臣民于天雨欲降时节到田间共同劳作，表达的不仅是崇尚和提倡劳动，还体现出了天、地、人合一协作的内涵；官府给予劳动者福利，实含鼓励广大劳动者继续努力、作出更大贡献之意。这就是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古代劳动节，它与近现代争取劳动者权益的“洋节”，差别还真是太大的。

钩沉



人物春秋